

《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 深刻解读“两个结合”

□梁嗣辰

在《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作者张城提炼了三个关键词:文明、革命、道路。文明即中华文明,革命即中国革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本书的主旨,即是助力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阐述中国道路的革命现实性和文明主体性。

作者认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开辟并非偶然,是由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中国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两个结合”赋予中国道路以革命之现实性和文明之主体性。

“魂”和“根”是与“两个结合”主旨相一致的。把握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这个“一体两面”关系,就把握住了“两个结合”的本质特征。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两个老祖宗”,是中国道路的“魂脉”和“根脉”,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的精神之源。既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又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精神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更好筑牢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和文明底蕴,更深入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律,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人类文明之更新。

作者认为,中华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实践本身即具有一种方法论意义,以此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保持民族精神的主体性、独立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总体而言,本书从历史中提炼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从现实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从中国道路中体悟中华文明的深刻底蕴。立论深刻,剖析细密,见解独到,引证丰富,注重逻辑推理,在旁征博引的同时,又能做到言必有据、史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联系现实。全书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的内在原因,助力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是一部严肃扎实深刻的理论专著。

《追花的人》 重温革命故事,做追“花”之人

□樊学梅

90多年前,红军在江西、福建等地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围剿与反围剿的五次斗争。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然而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根据地实行围困,其中经济困是重中之重。粮食、日用品等当地能勉强生产,勒紧裤带应对,可食盐、西药、枪支弹药等紧俏物资,不得不靠外面运入。此时,红军急需开辟一条甚至数条秘密交通线。这就是张品成红色主题小说《追花的人》(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故事背景。

青少年时,张品成生活在红军长征的起点——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从小听了许多红军故事,非常熟悉赣南的历史。在作品中,他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安远县的尊三围和寻乌、全南两县的秘密交通线,将叙述视野由中央苏区的几个中心县转到赣南闽西,将鲜为人知的历史呈现给当下的读者。

然而,张品成并没有直接写秘密交通线,也没有正面描写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战斗的宏大场面,而是选取历史的一个剖面,选择一个小的切入点,以赣南水乡一对养蜂卖蜜的父子(父亲季米与少年宽田)跌宕起伏的命运为主线,通过他们与红军的特殊关系,写出了普通百姓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长,展现了他们善良淳朴的美好品德,还原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共产党人患难与共、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正如张品成所说:“我写了几十本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没有一部是正面写战争或者战斗的,那并不是我不懂战争、不了解战争,或者是缺少对战争的体验,只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正面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我们必须要全方位地看待历史。所以我觉得我必须把精力放在战争以外的革命历史、种种历史现象、人物和经典故事。”

叙事语言和对话是本书的另一大



特色。熟悉张品成的读者应该都有这个感觉:他是用方言和客家话来写作的。在《追花的人》中,张品成依然如此。他在文本中融入了许多客家文化,比如在第三章第二节《杨大方第一次看见这种建筑》中,就详细介绍了赣南围屋的外形、结构、功能等特点。不仅如此,书中还涉及当地的饮食文化和百姓的生活等,比如当地的特色小吃“三鲜粉”“灰水板”,以及待人接客的“八大碗”等。这些赣南客家文化的民风民俗、地域风情的介绍,为文本构筑了一种场景的真实、氛围的真实;人物对话所用的方言土语,更增添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可以说,张品成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时代赣南地区的城乡风貌、风土人情,也为当下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那个时代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追花的人》是一部红色历史题材小说,更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故事聚焦于一个成年和三个少年的身上,通过他们的成长变化,诠释了少年艰辛的成长之路,实现了讲述童年、讲述党史的双重含义,也将坚忍、乐观、奋进刻进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底色。总之,我们都是追“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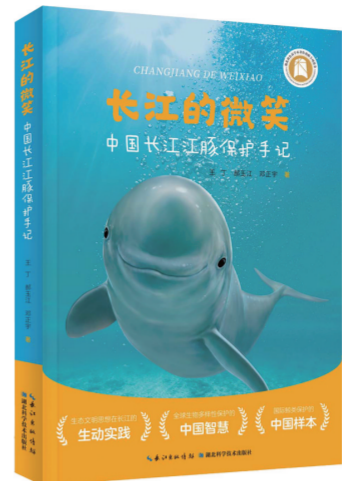
《长江的微笑:中国长江江豚保护手记》 江豚逐浪,一江碧水书写湖北答卷

□王承晨

长江江豚,一种只生活在长江中的哺乳动物,它们是长江的孩子,因为嘴角上扬,又被称为“微笑天使”。长江于曾是豚类最理想的栖息环境,但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展,豚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夹缝中生存的它们一度遭遇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危机。

一江碧水护安澜。随着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长江边再现江豚逐浪,水清岸绿,相映成趣。从危机到转机,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也许,你能从这本新书《长江的微笑:中国长江江豚保护手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讲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鲸类保护生物学学科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恪守“国家的需要就是最大的需要”这一信念,通过不断努力,逐步摸索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江豚保护经验,再到现在作为“中国智慧”,为世界珍稀水生动物的“保种”及保护带来信心和希望的故事。书中再现了众多科学家数十年坚守初心,投身江豚保护事业的奉献精神,同时也传达了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考和理解。

科研之路总是在曲折中前进,透过《长江的微笑:中国长江江豚保护手记》一书,你将见到江豚如何被“催生”、江豚小宝宝如何诞生,江豚如何被野化放归长江……这不仅是一本长江江豚保护手



记,也是一部长江生态保护的蝶变史。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有很多一生都致力于鲸类研究的科学家,他们一辈子的学术生涯都与江豚有关。正是这些科研工作者,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在鲸类研究方面取得的一系列国内外瞩目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的鲸类研究不断向前拓展,为实现中国梦贡献了科研力量。

为了更好地保护长江生态,科研人员提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大保护措施,并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管下积极推行。目前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鄱阳

湖两大湖区已建成8个不同级别的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长江中下游干流栖息地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满足江豚等水生生物生存的需求。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数据,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向好,多样性水平有所提升。长江总体生态环境积极向好非常有利于江豚的栖息繁衍。

长久以来,江豚是长江中最兴旺的物种之一。“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岳阳楼别窦司直》中写道:“江豚时出戏,惊波忽荡漾”,如此颇有生气的句子今人读来还能感同身受。“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不知清朝诗人薛时雨当年写下这首诗时,会不会想到几百年后,这样的美景会在长江频频出现。

“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2023年10月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再一次强调“长江文化”。“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一次次深情凝望,一句句殷切叮嘱,习近平总书记情牵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

长江文化源远流长,从江豚逐浪中,瞭望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新发展,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这也是湖北为“长江大保护”交出的最美答卷。

《火城1938》 做有记忆的人有时并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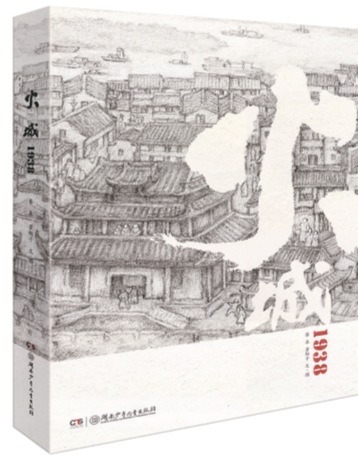
□阿甲

“在我记忆深处,有一座城,那里珍藏着我的童年……请容许我用我的方式描绘我记忆的古城,它浮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总是美丽而忧伤,它有着不能忘却的记忆。”当蔡皋在《火城1938》(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中以书信的方式饱含深情地写下这段开场白时,她笔下带出的既有她个人的痕迹,也包含了许多远远超越她个体的记忆。

那是一座城市被焚毁的记忆,糅合在数亿人痛苦的战争回忆中,或许是因为过于痛苦,或许是因为与更宏大的痛苦相比似乎有点微不足道,反而渐渐被人们遗忘……

在战争中被焚毁的城市也是有的,我们即使不去读历史书,也可能在文学作品中读到,比如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读到了拿破仑的入侵中莫斯科的焚毁,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中读到了南北战争中亚特兰大的焚毁……但直到我读到蔡皋与女儿联手创作的《火城》,我才知道自己曾多次路经的长沙,原来也有一段类似的记忆。

其实,1946年出生于长沙的蔡皋并没有亲历那场焚毁古城长沙的“文夕大火”,但她听自己的舅舅、姨妈多次讲过,她认为很有必要用图画书记下这些可能渐渐被人遗忘的巨大创伤,让孩子们感受并理解战争的可怕,也许这才是



寻求永久和平之道。不过,画下那段记忆的过程是很难过的,画面非常沉重,所以没有涂上色彩,那是一个城市的悲哀,用一幅长卷来展开。长卷前面的部分是曾经富庶喧闹的和平场景,多少会让人联想到《清明上河图》,但等到书中那对小姐妹在放学的路上走过大盛绸庄之后,画面转入了战争阴霾下的街景。蔡皋与女儿联手,她们谁都没有亲眼见过被焚毁之前的长沙!她们需要收集整理关于老长沙的大量图文资料,在此基础上重绘老人们记忆中的长沙。这是怎样一项浩大的工程!而在完成这项工程

的同时,她们还需要画出一个连续完整的故事,因为这是一本要给朋友看的图画书。

在《火城1938》长卷画面中,一对小妹妹贯穿始终,直到封底还能看到她俩的背影。作为艺术家,蔡皋在努力还原当时人们的感受,而且是“讲小孩子目击的过程,不想加入个人的评论”。长卷画面的后半部分充满了战争的暗示,告诉人们这场可怕的灾难是由战争引发的,但相关的文字却以小孩子的口吻讲述,在那份孩子特有的天真懵懂中,反衬出这场悲剧的巨大和惨痛。

《火城1938》文字处理非常大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图画书文本呈现方式。蔡皋以小妹妹中姐姐的口吻写了一封四页纸的长信,介绍了战火前的长沙、她的家人和同学们幸福快乐的生活,接着就是后面所发生的一切……“大火烧了五天五夜……没有了,我们的学校,没有了,我的家,没有了,古城……”——因为文字没有嵌入画面中,那幅长卷画变得更为自由了,读者可以将它看作一本长卷的无字书,自己从中读出故事来;而那封信来自画中故事的小女孩主人公,读者可以理解,那是她在整个故事背景中独立写的一封信,不必逐页与画面呼应。这样的阅读,对于读者的期待更高了,但给读者留下的空间也更开阔了。

《浙江近代进步报刊史(1897—1949)》 遵史学方法开展报刊史研究

□矫正

浙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红船精神的发源地,拥有璀璨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近代进步报刊便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种,它详细记录了激烈变革时期浙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状态,是研究近代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近代进步报刊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的有效工具,是浙江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梳理和研究近代浙江进步报刊史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弥补了浙江近代进步报刊研究薄弱的遗憾。在挖掘与考证浙江近代进步报刊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浙江近代进步报刊的历史沿革,分析其发展背景,展示每一阶段中进步报刊特色,探究其功能与贡献,填补浙江报刊史研究的学术空白。二是为红色文化研究添砖加瓦。系统整理和研究浙江近代进步报刊,对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浙江近代历史,对于广大红色文化工作者和红色文化爱好者更有效地推进浙江红色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三是追溯浙江进步报刊的发展历史。展示浙江进步报刊宣传活动的闪光印记,



对于全面了解浙江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大有帮助。

《浙江近代进步报刊史(1897—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以时间为纬,论述了1897—1949年浙江地区所有进步报刊创办、发展、勃兴的历程,分为近代、

民国初期、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等七章。每章均以“背景”“概况”“影响”为主线展开论述,并于章末附录总结性的“一览表”,包括报刊名称、刊期、主办者、主编、创办日期、出版地和相关信息备注,使读者对该章内容一目了然。

该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探讨了浙江近代进步报刊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书中显见以下两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研究法——通过汇编史料、图书馆期刊目录、图书馆收藏报刊史料,搜集浙江近代进步报刊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个案分析法——浙江近代进步报刊内容纷繁复杂,在研究中不可能面面俱到,选取部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进步报刊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尝试以点带面勾勒浙江近代进步报刊史的发展状况。

报刊史既是新闻学的分支,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对报刊史的研究应遵从史学研究的方法,以实证为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本书完全做到了这一点。